

· 人文新探 ·

福柯知识考古学视野下的 针灸人文研究启示与思考

王 丽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 北京 100700)

摘 要: 福柯知识考古学对知识生成的分析与考察为针灸人文研究提供了理论启示及方法提示。通过构建—解构—重构的考古学方式探讨针灸知识的生成及理论化是考察针灸话语实践、按照既定秩序和规则探寻针灸知识表达形式的有效方法。将知识考古的方法应用于针灸人文研究进行思路检视及方法探讨, 是对针灸学科理论研究的自省, 可以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路径, 呈现不同的思考视角, 扩大研究者的科研视野。

关键词: 人文研究; 针灸; 知识考古学; 福柯

DOI: 10.16307/j.1673-6281.2024.04.005

中图分类号: R-092; G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6281(2024)04-0333-008

Inspiration and Thinking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Humanities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ucault's Knowledge Archaeology

WANG Li

Institute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e analysis and investigation of knowledge generation by Foucault's knowledge archaeology provide theoretical enlightenment and methodological hints for research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on humanities. Exploring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heory through the archeological way of construction-deconstruction-reconstruc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nvestigate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discourse practice and explore the expression form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knowledge according to the established order and rules. This paper examines and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archaeological methods to the study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heory. It is a self-examin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which can provide a new way of thinking, present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thinking, and expand researchers' scientific research horizons.

[KeyWords] Humanities Research;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Knowledge Archaeology; Foucault

[基金项目] 中国中医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项目 (CI2021A00212)

[作者简介] 王丽 (ORCID: 0000-0002-6377-9352), 副研究员; E-mail: 58771873@qq.com

针灸知识在过去一直以文本传承为主,但近年来,针灸相关文物、文献的陆续出土生动还原了早期针灸知识的原貌,呈现了针灸知识的产生及理论化过程。针灸知识源于医疗实践,实践经验与感知之所以型塑为知识,根本原因在于能够进一步指导临床,即针灸学知识存在的前提是其功用性。针灸知识理论化以归纳逻辑的应用为主,在知识构建的过程中,明显表现出连续性的特点。针灸理论的建构亦如是。一般认为,《内经》奠定了经典针灸理论的基础,《难经》补充发展了针灸理论知识,《针灸甲乙经》进一步将针灸知识系统化和结构化,形成了完整的针灸理论体系。后世医家虽各有发挥,但总体并没有太大突破。不可否认的是,在针灸理论的构建过程中,社会的转型、文化的变迁和经济的变革对针灸知识的传承及流变都具有深远的影响。社会对针刺技术及知识的态度,都曾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柏拉图认为知识的形成需要满足被验证过的、正确的和令人信服的3个条件,这在中医针灸知识生产的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经典针灸理论构建的过程中,学者往往会在不同时期之间构建起一种起承转合的连续性,试图找寻其逻辑上的必然性或存在的因果关系,并以此为基础进行针灸理论的建构。而在归纳逻辑并形成规律的过程中,一些与主要内容相背离、偶然出现或者无法归类的事物往往被忽略或舍弃,比如曾经使用过又因为各种原因弃之不用的针灸工具、出现过又消失的治疗部位及治疗手段等,这正是法国思想家福柯所质疑的。实际上,这部分被舍弃的内容也是客观存在的真实历史事件,代表着某种具体的针灸知识。

传统理论分析的研究方法注重使芜杂的文献资料变得清晰,寻找具有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即传统理论分析方法试图寻找并构建事物的内在秩序性,让客观世界具有规律,让不同者趋同,让相异者同名。但在此过程中,往往忽略了人的主体性在其中的作用、主体意识与客观世界的非同一性,以及客观世界的非秩序性,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恰恰可以补充这部分内容。本文就福柯知识考古方法在针灸人文及理论研究上的应用进行思路检视及方法探讨,就正于同道。

一、针灸知识考古的认识基础

知识考古学为法国思想家福柯所提出,他在研究中引入“话语”的概念,认为知识的构造依赖某种先验的“话语”形成,而这种话语既有历史性,又具备经验性特征。知识考古学试图挖掘知识的深层、对现行的知识作进一步解构,从对象、陈述、概念、策略(理论)4个方面探索构成知识的话语的出现、变化及形成。福柯倡导以考古学对待“遗迹”的方式去分析文献(话语),对待话语事件要“先破后立”。为便于理解,福柯以19世纪精神病学的建立为例,以新对象的出现(新的个体、新的行为分类被描述为病理性的)一新陈述样态的应用(定量标记和统计计算)一新概念的描画(像堕落、变态、神经症等概念)一新理论的建立(精神病学)这4个要素最终形成精神病学的话语实践的过程,展示了精神病学理论大厦在外部环境(刑事法学、人口压力、劳动力需求、救济形式、拘留的地位和司法条件等)不断变化下的构建规则^{[1]90-91}。

福柯认为,在科学的进程中,总会有一些短暂的,偏离唯一规律的偶然事件、创举或发明等,因与历史的普遍模式相异而被忽略、抑制,甚至消除,这些分散的事件理应构成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1]9-10}。知识考古学不但要还原话语产生之前的状貌,更要对形成的因素进行一一甄别、检视、敲打、触摸,以辨识其背后的面孔,寻找权力角逐的根源^[2]。此处“权力”并不是狭义上的政治专指,而是指能够影响话语实践的一切因素和力量^[3]。考古学要指出的不是这些力量如何决定话语的意义和形式,而是它们如何成为话语出现、融入和运行的条件的一部分^{[1]91}。

理论研究中常常被忽略的一个问题是“谁在说话(书写)”?在文字社会里,文字记录的权威掌握在少数的精英人群手中,而一项技术的选择、淘汰、流传、演变是层层积累的。不仅是某一项特定的针灸技术,记录者自身的经验、理解能力、认知水平、所处的社会阶层等方面都影响着针灸知识的传承与流转。尤其在封建社会,文本方式的知识传承与口传心授的技术流传之间存在不容忽视的差距。换句话说,

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传世文献中的针灸知识及技术是经过筛选的。在研究过程中，要考虑到针灸理论构建过程中被忽略掉，甚至舍弃掉的知识与技术的本来面貌，并分析其原因。置身于不同的历史场域，要时刻重视被忽视掉的话语的还原，试图挖掘“文献”和“文物”的不同层面，寻求知识在其中不同的展演形态，并追究其之所以可能的理由。

针灸理论历经两千多年的岁月流转，仍然存在许多被遮蔽的“陈述”和“知识”。流传至今的针灸文献资料是被叙述的历史，而不是真实的过去。经过后人阐释、解读的基本概念也或多或少会发生改变。写文本（针灸医籍）、创作主体（医家）以及主体意识背后的各种力量是如何发生作用，作用机制的功能方式和实践形式应当为学者所关注。借助考古学的方法论，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学者个体之外的因素，或者说是针灸理论发展的话语环境，深入发掘其内在意义，避免仅仅将其当作一种通则式的背景概论。

二、针灸知识考古的研究范畴

知识考古学是一种较新的研究方法，是以还原的眼光对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环境进行综合研究。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知识考古学更注重文献资料背后错综复杂的力量交锋，话语实践构建过程中权力的作用，及最终形成的知识背后对话与妥协的复杂机制。对针灸技术及理论的知识考古学检视，“为何出现，如何形成”的问题回答，于学科发展的意义在于其关注的是技术的动态发展。在这幅动态的图画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的力量是如何推动不同的话语实践，并由此形成知识策略（理论）的。

福柯所谓的“话语”具有明确的界定，“话语不是某种把自己的计划纳入语言的外部形式之中的意识；不是一种语言，也不是讲这种语言的主体。它是一种具有本身的连贯和连续形式的实践”^{[1]32-36}，即“话语实践”。将知识考古学的视野检视具体到针灸学科，针灸知识考古的研究范畴应当是作为实践的“针灸话语”，即针灸理论知识、针灸文本（文献资料）、医疗实践主体（医者及患者）、文本创作主体（医者或作者）及其主体意识之间的复杂关系，包括关系各方的互相影响、交锋针对、交错纠缠、对话协商，并最终形成针灸知识或针灸理论的机制，以及这些机制发生作用的功能方式和实践形式。

三、针灸知识考古的方法分析

知识考古学最初用于史家思想史的研究，后广泛应用于史学、法学、经济学、文学、美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中，有学者将其引入中医科研中。知识考古学作为方法论研究中医，始于学者从人文医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角度对中医困境的思考^[4-5]。研究方法上也有学者将其与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相结合，通过对单本著作或单个人物形象的知识考古，呈现如何使文献本身展示出大量的素材，并通过区分、组合，寻找理性，建立联系，最终构成整体，从而获得有效的历史知识^[6-7]，为针灸知识考古的方法提供参考。

（一）话语分析：语言表象与知识生产

福柯认为，历史的书写中掺杂着大量主体的主观话语，加之语言本身就与真实事物及真实事件存在差异，这样的历史受到话语环境（书写者的阶级立场、个人学识见解、社会环境及时代潮流）的影响，真实性亦受影响，其中必然存在缺失甚或错误。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针灸知识的文本化、理论化过程中。甚者，针灸知识在理论化过程中受到话语环境的控制更加明显，这与针灸理论的哲学属性有关。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十二经脉如环无端流注”模式的形成，其他如“方圆补泻”“九六补泻”、腧穴的五行属性等等都是话语环境控制下的烙印。古代社会很多医者首先是儒者，或是亦儒亦医，他们在书写针灸知识的时候，或多或少会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此外，佛、道也藉由医籍宣扬其精神，导致某些针灸知

识的真实面目难以廓清，在理解上设置了障碍，这就需要回到针灸知识产生的本源环境。

文献资料研究是针灸理论研究的基石，研究者要在各种文献中比较、印证、求真、去伪，最终形成新的针灸知识，文献资料的重要地位由此可知。然而，要想揭开笼罩在文献资料上的重重面纱还原其真实面貌却非易事。早在1956年，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对文明进行研究时，提出大传统（由城镇的知识阶级所掌控书写的文化传统）、小传统（由乡民通过口传等方式传承的大众文化传统）的概念，用来扩大研究者的视野。有学者鉴于中国文化多层叠加的复杂性，依据符号学将文字产生之前的时代视为大传统，将汉字编码的文化视为小传统^[8]。这样的二分结构视角，能够帮助研究者辨识小传统下的认知局限，透过文字的遮蔽还原大传统中的知识原貌。

宽广的中医学视野和丰富的文献资料、考古材料及文物图像资料为新知识的产生提供了可能。针灸医疗实践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对工具的依赖，然而，经历朝代更迭，穿越千年仍流传下来的针灸工具当属凤毛麟角。我们目前能够见到的出土或传世的针具、灸具、铜人、图谱等，无不承载着古代世界的真实信息，是研究考据、分析阐释以及证实、证伪的重要切入点。虽然《内经》中就有关于九针针具的文字记载，但直到元代杜思敬《针经摘英集》中，才见有关九针的图式描绘。期间一千多年，关于九针的形制立意、外形结构等内容却很少述及。九针之外，是否还有其他金属针具的应用？如有，其应用情况如何？相关研究很少述及。

美术作品中，宋代画家李唐所作《灸艾图》是为数不多的以针灸治疗为题材的画作之一，作者呈现了1幅村医用艾炷直接灸的方法为患者治疗痈疽的图景。灸法之外，《灸艾图》还展示了痈疽治疗不可或缺的一步——破痈排脓。所用针具外形似刀，中有起脊，针柄缠绕棕黄色线状物，末端似呈环状。从医者持握方式及操作角度推测其一面开刃，主要作切、划、割之用（图1）。学界普遍认为，医者所用针具为铍针，据《灵枢·九针论》所记，铍针长四寸，宽二分半，宽度与长度约为1比16。《汉书·律历志》述“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9]，表明秦汉时的一尺约相当于今天的23~24 cm^①。可知铍针长约为9.2~9.6 cm，宽约为0.575~0.6 cm，与图中针具差距较大。仔细观察，画中医者的发髻上，还插着3枚形制不同的针具，一枚尖端锋利形如剑，一枚尖端稍尖，另有一枚尖端为平圆形（见图2）。上述针具不同于《黄帝内经》九针，检索文献亦未见相似形制的针具，作用不甚明了，推测或为民间流通使用的医疗用具。《灸艾图》所绘的这4种工（针）具，是考察古代针具的形制变化及针具与外科器具演化关系的重要线索和参考资料，尤其是“九针”中的铍针。据笔者考证，铍针的形制及应用在宋明以后产生较大的变化。



图1 宋李唐《灸艾图》中的针具



图2 医者帽中所插针具

① 甘肃天水放马滩一号墓出土木质秦“度器”，据换算，每尺约为24 cm。目前秦尺度的换算标准多以传世商鞅铜方升为据，换算之后，一秦尺约23.1 cm。汉代度量承袭自秦，据出土的两汉各类尺子换算，西汉一尺约等于23~23.2 cm，东汉一尺约等于23~24 cm。详见邱光明《计量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04-208页）；姜波《秦汉度量衡制度的考古学研究》（《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2年第4期，第27-32页）。

以往的研究对单个出现的图像、文物等关注度不够，使得其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编码不能很好地被看见。《灸艾图》中的针具就是很有力的证据。福柯的知识考古方法重点关注这些单个出现的偶然事件所反映的信息，他认为任何一个事件都可以同其他事件产生联系，并展现真实的世界，即解构主义所谓的“延宕性”。针灸人文及理论研究高度依赖文献资料，这些文献以“知识的文本”的形态流传下来，作为针灸研究的基础，又构成新的知识文本继续流传。其传承基于内在的逻辑必然性，与之相应的知识经过加工保留下来，相异者则被摒弃。新知识的产生往往涉及思想的转变和研究方法的发展^{[10]296}，历史研究如此，针灸人文及理论研究亦如是。

(二) 知识与话语的解构

福柯强调了知识问题的重要性，研究目的在于揭示知识同社会制度及话语者的关系，知识同社会中人的思想观念及其思维模式的关系。科学研究中的知识就是典型的话语体系，因此对于话语的解构，必须从知识的解构开始^{[11]427-428}。虽然本文无意于揭示社会运作的动力基础，但解构针灸知识的建构和扩散过程，是对以往经典针灸知识体系的深刻剖析，也有助于开辟新的认知观念。

以经脉理论为例，解剖其形成过程，呈现主体意识、语言及知识与客观事物及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针灸知识体系中，经脉系统多指十二经脉及奇经八脉，体系之外，《内经》中尚有“某某脉”的称谓，浪花般闪现后又消失在浩渺的知识海洋。2012年老官山出土文献中“间别脉”的记载，进一步确证经验性实践只有符合某种权利的规则，才能构成知识，否则就会被舍弃。如“角孙脉”，出自《灵枢·寒热病》“足太阳有人頄遍齿者，名曰角孙。上齿龋，取之在鼻与頄前。方病之时，其脉盛，盛则泻之，虚则补之。一曰取之出鼻外”，根据上下文意，此处的“角孙”应为“角孙脉”，检索马王堆出土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及《灵枢·经脉》，均不见足太阳脉有“分支入頄遍齿者”。再看《针灸甲乙经》，足太阳经也没有腧穴可以治疗龋齿。“角孙穴”今属于手少阳三焦经，从部位角度看，位于侧头，医籍中多有灸侧头面部、耳周动脉用以治疗耳聋、疟疾，风症等。说明在形成《灵枢·经脉》中经典的十二经脉系统时，作者在对多家经脉学说进行整合、重组的过程中是有取舍的。足太阳行于后背，所以舍弃侧头部的角孙脉分支；角孙脉“入頄遍齿”，且行至“鼻与頄前”，在部位上位于头侧，属少阳，但其并未作为任何分支出现在十二经脉中，而是被糅合入足少阳经、手少阳经及手太阳经的经脉中，进行重新整合，这点在三条经脉的循行中可以看出（表1）。

表1 足少阳、手少阳、手太阳脉在《足臂》《灵枢·经脉》中循行比较

脉 别	循行路线	
	《足臂十一脉灸经》	《灵枢·经脉》
足少阳脉	出于踝前，枝于骨间，上贯膝外廉，出于股外廉，出胁；枝之肩髃；其直者贯腋，出于项、耳，出（枕），出目外眦。	起于目锐眦……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锐眦后；其支者，别锐眦，下大迎，合于手少阳，抵于頄，下加颊车……
手少阳脉	出中指，循臂上骨下廉， <u>透耳</u> 。	起于小指次指之端……以屈下颊至頄，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过客主人前，交颊，至目锐眦。
手太阳脉	出小指，循骨下廉，出臑下廉，出肩外廉，出项□□□目外渍（眦）。	起于小指之端……从缺盆循颈上颊，至目锐眦，却入耳中。其支者，别颊上頄抵鼻，至目内眦，斜络于颧

在《针灸甲乙经》中，足太阳经脉没有治疗龋齿的具体腧穴出现，但在侧头部角孙穴附近有足少阳经的目窗、正营、完骨、浮白等穴可治疗龋齿，当与角孙脉曾于此处循行通过有关；而角孙脉的远端治疗作用，则分别体现在手少阳与手太阳经均有远端腧穴治疗龋齿上。角孙脉到穴的变化过程的推演，可

以呈现在主体意识影响下的知识生产加工过程。对今天的研究者来说，能够更加客观的看待现存知识，帮助探究知识背后的真实面目，并加以理解应用。

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足厥阴肝经经脉循行的形成过程中：《五十二病方》记载灸“中颠”（即巅顶部的百会穴）可治“肠癰”（即疝气），《阴阳十一脉灸经》中述“癰疝”是厥阴脉病候。问题在于，无论《足臂十一脉灸经》或是《阴阳十一脉灸经》，足厥阴脉的循行，均未上头部，与“中颠”产生联系，也不到达阴器，上述主病及治疗现象似乎无据可依。为解决这个问题，《灵枢·经脉》在足厥阴肝经中补充了至巅顶及环阴器的经脉循行（表2）。

表2 《足臂》《阴阳》与《灵枢·经脉》中厥阴脉循行比较

出 处	循行路线
《足臂》	循大指间以上，出筋内廉，上八寸，交太阴脉，循股内，上入腓间
《阴阳》（甲本）	系于足大趾鼓毛之上，乘足跗上廉，去内踝一寸，上踝五寸而出太阴之后，上出鱼股内廉，触少腹，大渍旁 [*]
《灵枢·经脉》	起于大指丛毛之际，上循足跗上廉，去内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阴之后，上腓内廉，循股阴，入毛中，环阴器，抵小腹，挟胃，属肝胆，上贯膈，布肋肋，循喉咙之后，上入颠顶，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于颠；其支者，从目系下颊里，环唇内；其支者，复从肝别贯膈，上注肺

*注：大渍旁，乙本作“大背旁”。张家山《脉书》作“夹肺旁”。

《灵枢·经脉》足厥阴经的循行在胫部“交出太阴”之后，补充了膝股部的循行，并“入毛中，环阴器”与前阴产生联系，在足厥阴经上行头部之后，又补充了“与督脉会于颠”的循行路线。如此，既为《阴阳十一脉灸经》中足厥阴脉主“癰疝”提供了合理解释，又为“巅顶”治疗“癰疝”提供了依据。

（三）事物的秩序与知识型

福柯认为，万事万物皆有秩序，任何使用语言文字记录或表达的知识及理论，都带有经验性的特点，“知识型”的出现就是为了弃置主体（书写者或具有话语权力的主体）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一个特定的时间、地域、空间中的所有智力活动都遵循某种知识译码的规律，人们对事物的秩序和知识的理解创造都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某些知识在主题和内容上是不同的，但在知识的内在构成、组织形式和表意法则上是相似的，即具有同样的知识型。也就是说，在特定的时期，人们看待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是特定的。福柯在《词与物》中强调，知识型“意在探究知识和理论在何种基础上成为可能，知识在怎样的空间得以构建，在何种历史前提下……观念得以呈现，科学得以建立”^[12]。在人类社会知识生产活动的实际过程中，人们据此完成知识规则或秩序的建构，而这些秩序或规则以各种显在的或隐含的方式影响、介入、干预甚至直接决定知识生产的方式与结果^[13]。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各门类的理论与知识体系的建立均是如此。

知识型并非知识，而是某种规则、秩序、构建法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认知结构不同，知识型当然也不同，对该时期普遍知识型的考察，即是福柯所谓“考古学”。他所关心的是具体的经验和知识背后的东西。受考古学方法的影响，福柯用“地层”的概念类比真实的历史及历史文化，即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知识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一层层叠加起来的。在特定的历史地层中，各种知识、理论往往具有一些相似性或共通之处，基于这些共同特征，不同的知识理论产生了内在的关联，即使在不同的学科知识之间，这种关联性依然存在。这种认识打破了同一知识层中不同学科知识间的藩篱，跳脱出现代

学科分类的界限，成为福柯知识谱系理论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知识型”是某一历史地层中所有知识形成的规则之一（非唯一的）。以知识型的眼光看待针灸知识体系，发现其有明显的断裂、不连续性特征。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社会文化思潮影响了该时期的针灸知识体系，导致其知识带有某种时代特征的认知特异性。

远古人类对自然力量的敬畏理解表达为神话崇拜、图腾崇拜，人类社会出现之后，社会活动的秩序化依赖文字的形成以及知识的产生。这个过程中，人们对于“自然”“天”“天道”的追求与向往始终如一。“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几乎贯穿整个中国古代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历史。古人“仰观天象”并基于日月星宿的自然规则与秩序建立社会的规则与秩序，其内在联系或显或在隐藏于古代各学科门类的知识、理论形成及构建过程中，同样也存在于针灸知识的产生及书写中。

具体到针灸理论研究，考察先秦两汉的文献资料（处于同一知识地层中）固然有助于了解文献形成的时代背景及逻辑关系，同时借助其他知识“地层”中的相同知识型材料进行知识考古，也对针灸文献中大量概念、术语的溯源、形成、理解、阐释等大有裨益。尤其是对古典针灸知识体系、理论架构的建立，针灸名词、术语、概念的形成路径，要有充分的认识，其思想观念、哲学主张的溯源不能止步于先秦两汉。在“人道合于天道”思想的指导下，针灸知识的产生、理论的构建同样受到古代天文学的巨大影响，只不过由于时间久远，相关资料较少，这种影响或被时间淹没，或隐匿于文字背后，只有用知识考古的眼光去审视，才能窥其一二。

再有，《内经》对个别数字青睐有加，如“九”“五”“六”“十二”等等。《灵枢》开篇列“九针十二原”，先讲针具，次讲五脏原穴，后文的编排次序上又在“经脉”之前列“官针”，并具体规定“九针”的形制及作用。然而，细数整部《灵枢》，大部分都是在讲毫针刺法，除“九针十二原”及“官针”之外，几乎见不到关于鑱针、鍉针、大针用法的记载。《灵枢·官针》载“圣人起天地之数也……以针应数”，意思是之所以规定九种形制的针具是为呼应天数“九”。古人对“九”数的崇拜可以追溯到最初对天体运动的观测，用于推算日月星辰的行程，以确定并保持月份与时令节气的正常关系^[14]。对数字“五”的理解也是一样。古人认为“五”为生命之数，对清华简《保训》的解读验证了该观念^[15]，而“五”及“五行”等概念的出现也源自于对日月五星（金、木、水、火、土星，古代称太白、岁星、辰星、荧惑、镇星）运行轨迹的考察。此外，古代数学中的对称思想与针灸理论的构建、针刺取穴治疗等也有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性，限于篇幅，不一一赘述。

作为知识体系的医学学科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包括了人们对正常生命现象的认识和规律探讨，对疾病现象及防治手段的认识，其中知识的生产、贮存、传播及传授活动具有内在的延续性特征，尤其对疾病认识的加深和疾病防治效能的增强方面，其连续性及其秩序性也不容忽视。需要关注的是，知识考古学的关键是探寻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受到支配的规则^[16]。在知识考古学视角下，不同时期的针灸话语各自独立，他们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也不总是代表着针灸医学的进步。换句话说，各个时期的针灸话语是断裂的，而非连续的，他们的存在更多的是话语背后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就是发现这些断裂与非连续性，并研究其成为可能的机制与条件。换句话说，虽然针灸知识体系具有不可忽视的连续性及其秩序性，但知识背后的话语、权利、规训、规则是断裂的，二者并不冲突。

福柯知识考古学对知识生成的分析与考察为针灸研究提供了理论启示及方法提示。对象—陈述—概念—策略（理论）4个要素是解构以及重构知识体系的认识路径，也是考察针灸话语实践，按照既定秩序和规则探寻针灸知识表达形式的有效方法。知识考古学在人文社科类研究中的应用中业已崭露头角，将其应用到针灸人文研究中，可以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路径，呈现不同的思考视角，扩大研究者的科研视野。

参考文献

- [1] 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 [M]. 董树宝,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
- [2] 郝庆军. 作为研究方法的知识考古学 [J]. 天津社会科学, 2004(4):112-116.
- [3] 王平. 话语权力的交锋: 基于知识考古学的中国特色图书馆学理论体系构建分析 [J]. 图书馆, 2019(10):1-7.
- [4] 孙慕义, 万旭. 医学人文运动与知识考古: 中国人文医学的战略与策略 [J]. 医学与哲学, 2003, 24(12):6-10.
- [5] 李虹, 吴宗杰, 顾晔. 从知识—权力—话语考古中医 [J]. 科技通报, 2012(1):189-191.
- [6] 叶舒宪. 什么是“文化文本”: 中国文化理论建构的文学人类学视角 [J]. 中外文化与文论, 2021(4):187-194.
- [7] 许兆昌, 杨龙. 《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形象的知识考古 [J]. 史学集刊, 2012(5):5-12.
- [8] 叶舒宪. 探寻中国文化的大传统: 四重证据法与人文创新 [J]. 社会科学家, 2011, 175(11):8-14.
- [9] 姜波. 秦汉度量衡制度的考古学研究 [J]. 中国文物科学研究, 2012(4):27-32.
- [10] 夏洛特·罗伯茨, 基思·曼彻斯特. 疾病考古学 [M]. 张桦, 译.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0.
- [11] 冯俊. 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12] 米歇尔·福柯. 词与物: 人文科学考古学 [M]. 莫伟民,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6.
- [13] 姜文振. 福柯的“知识型”及其理论启示 [J].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 2020, 28(2):136-144.
- [14] 王玉川. “九九制会”与“黄钟”及其它 [J]. 陕西中医学院学报, 1985(3):21-26.
- [15] 邢文. 《保训》之“中”与天数“五” [J].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26(2):57-64.
- [16] 朱昱海. 论博物学历史中的“断裂”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0, 42(5):65-71.

(本文编辑 卢进)